

周恩来的最后岁月

I25
I27

I25
127

周恩来的最后岁月

1966 — 1976

安建设 编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351
751

周恩来的最后岁月（1966—1976）

编 者/安建设

责任编辑/王春明

封面设计/周小玮

版面设计/郑 刚

出版发行/中央文献出版社

经 销/新华书店

排 版/北京地质印刷厂排版车间

印 刷/北京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mm 32开 12印张 3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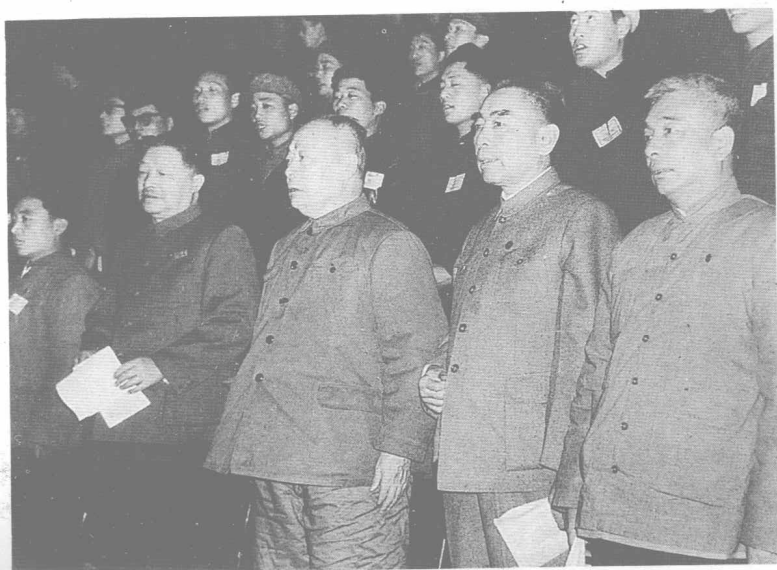
1995年12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 10001—30000册

ISBN 7—5073—0294—6/K·94 定价:16.00元



周恩来同毛泽东的最后一张合影。(1974年5月25日，北京中南海)



周恩来和陶铸(右一)、陈毅(右三)、贺龙(右四)
在批斗大会上。(1966年12月24日，北京体育馆)



周恩来最后一次到延安。(1973年6月9日，延安枣园)



周恩来在
山西大同华严
寺。(1973年9
月14日)

周恩来最
后一次在西安。
(1973年6月
11日)



周恩来最后
一次主持国庆招
待会。(1974年9
月30日,北京人
民大会堂)



周恩来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，作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
(1975年1月13日，北京人民大会堂)



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。
(1975年9月7日，北京三〇五医院)

目 录

- 中共中央、老一辈革命家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周恩来的评价
在“红卫兵运动”中 雍文涛 (4)
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几次斗争 穆欣 (15)
和“大闹怀仁堂”的战友们 周延 (31)
大树参天护英华 傅崇碧 (50)
“伍豪事件”的前前后后
.....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 (59)
- 共和国总理心中的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 周延 (68)
七亿人民的“总管家” 余秋里 (85)
特殊年代里的中央专委会 刘杰、刘柏罗 (102)
从八届十二中全会到“九大” [英] 韩素音 (113)
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吴德 (127)
向周总理汇报 孙一先 (154)
高举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 安建设 (169)
- 在外交部“夺权”前后 金戈 (207)
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之后 柴成文 (244)
“乒乓外交”始末 赵正洪 (255)
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魏史言 (270)
“饮水不忘掘井人”——中日建交纪实 姬鹏飞 (282)

邓小平的“复出”	铁 骥 (292)
175 位将军的“解放”	谢国民 (307)
“长沙决策”	铁 骥 (321)
最后的斗争	铁 骥 (337)

在周总理身边	周家鼎 (355)
最后的使命	高振普 (361)

附 录 周恩来著作及生平大事年表.....	(366)
后 记.....	(382)

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，鞠躬尽瘁。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。他顾全大局，任劳任怨，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，为尽量减少“文化大革命”所造成的损失，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，费尽了心血。他同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。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。

——摘自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

平水歌——

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工作的人。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，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，一生如此。我们认识很早，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。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。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，幸好保住了他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，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，做了好多违心的事。但人民原谅他。因为他不做这些事，不说这些话，他自己也保不住，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，起减少损失的作用。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。

——邓小平

没有周恩来同志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！

——陈 云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破坏活动，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、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。……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，周恩来同志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进行了长期的、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——叶剑英

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，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。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，环境复杂而又艰险，他如同“在荆棘中潜行，在泥泞中苦战”，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，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：减少政治损失，维持经济生活，保护广大干部，支持正义群众，改善对外关系，等等。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，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，以至在国际人士中，树立了忠诚、亲切、勤奋、坚毅、无私、无畏的崇高形象。

——李先念

这样大的局面，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过……

——周恩来

在「红卫兵运动」中

· 雍文涛 ·

1966年6月，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，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。8月，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。时值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初期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，当面聆听他的教导，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，处理问题，一直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。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，周总理严肃坚定地同林彪、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在这篇文章里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，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，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。

1966年8月24日，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，成立了北京市大、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，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。筹备了两天，26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。

一开始，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。当时，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，包括我在内，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，普遍有惶惑之感。但是，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，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，并做了重要讲话。周总理说，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，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。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，规定了任务。紧接着于9月1日和9月10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。在这两次会上，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，然后，有针对性地宣传、解释党的政策。两次大会之后，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，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，正确宣传、解释党的政策的，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。

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3个多月时间里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，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、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。小型的、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。无论是大型会议，还是小型个别会见，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、解释党的政策，做了大量工作。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，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。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。他那种不辞劳苦、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，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，克服了畏难情绪。那段时间，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（来信、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计算在内）。迄今回顾起来，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，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。

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，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“四旧”的浪潮，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，形成全市性的高潮。据9月5日的统计，到8月底止，全市共打死上千人，被抄家的1万多户。许多被斗、被打、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。一些学校的校长、教员、支部书记被斗致死，不少学校校长、教师被编入“劳改队”。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苔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，刚刚生下一个女儿，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（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）。在抄家的同时，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，从8月23日到9月9日，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，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。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、理发店张贴了“最后通牒”，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、奇怪发式，勒令关门停业；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，“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，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”，横批是“鬼聚堂”。那时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，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。

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，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，分别向党中央、中央文革、国务院作了汇报。当时主管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的中央文革，对我们上报的情况，表面上未置可否，但实际上已经不满，认为我们的观点、立场不对。9月5日，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“四旧”的简报，标题是“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——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”。简报称“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”，战果是“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”，“扫除了封建迷信”，“消灭了资本主义”。紧接着，在后来的天安门大会上，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“革命行动”“好得很”。说什么，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，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。

林彪、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“表扬”、“鼓励”，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，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，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，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？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。

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周总理于9月1日、10日、13日，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，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，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。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，周总理说：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，政权在我们手里，有政权，有武装，人有错误，可以批评，犯了法可以关起来，可以送去劳改。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，那也有人民的威力，有解放军的威力。所以，我们提倡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，不要动手打人。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、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，也应该是这样。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，周总理说：我们要团结大多数，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。敌人总是少数，朋友总是多数，打击面太大，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。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，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，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，有民愤、有血债、查有证据的反革命。右派分子，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。对资产阶级，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。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，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，不能动不动就搜查、抄家。即使对逃亡地主，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，到这里已经落户了，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，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。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，由你们去赶，那也不一定好。如果这样做，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，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，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，以为就完事了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，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，不是毛泽东思想，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。对知名人士，一定要慎重对待。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，到她家里去贴大

字报就不恰当。这只是说贴大字报，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，如打人、搜查、抄家，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。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，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，不要了。我反问他们，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？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去解决呢？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？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。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，周总理说：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，都作为公共的机关。像新疆一些地方，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，你要改变那个习惯，需要时间，宣传是可以的，强制就不对了。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、烧毁文物等，周总理提出：要保护国家财产，保护群众利益。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，可以出口，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，不能出口，非毁掉不可，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，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！

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，在当时很有针对性，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，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，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。据9月24日统计，听传达的大、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。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，下面反映很好。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。有的同学还说，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，总理好像都知道一样。

三

1966年秋末冬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势头更加猛烈。学校“停课闹革命”了，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，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。他们到处造反，导致生产混乱，社会动荡。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、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？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、利用？两种态度，两种做法，反映了